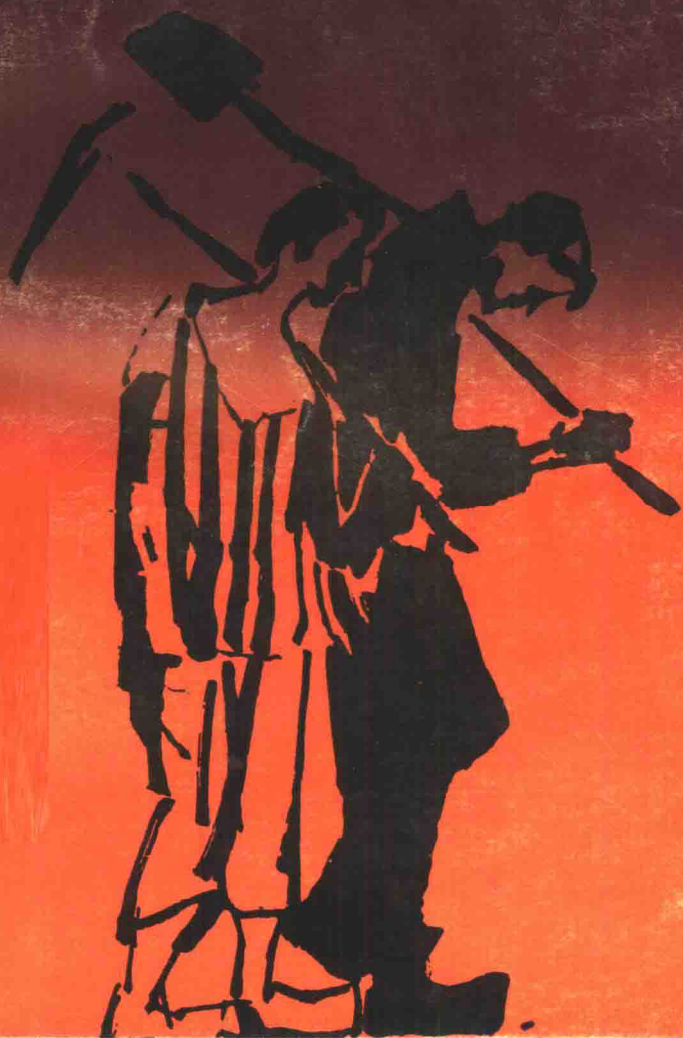


革命与流放

唐有章口述 刘晋庆整理



革命与流放

唐有章 口述
刘普庆 整理
责任编辑：郭平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)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198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开本，850×1168 1/32 印张，3.625 插页，4
字数，82000 印数，1—179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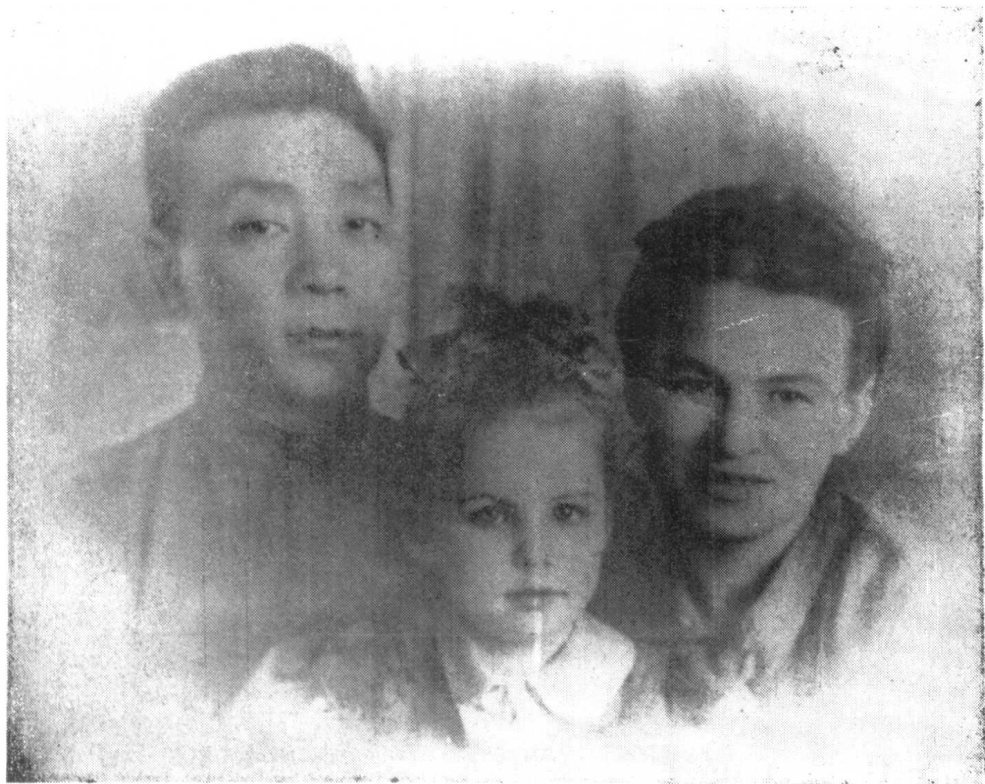
ISBN7—217—00390—3

K·38 定价：1.50元

新书目，88—51



唐有章近照



一九四六年与妻子女儿合影

联合工厂人员合影

一九五六年与马加丹市公共企业



一九四七年十月革命群众大会
与女儿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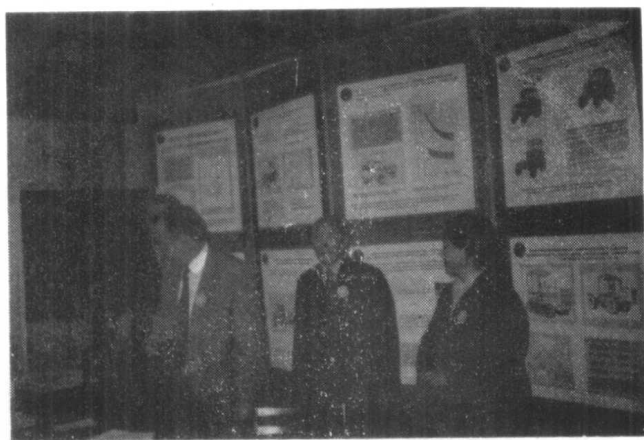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九六一年主持中国农机学会年会



会议展览厅

一九八一年在莫斯科农机



序

项 南

革命胜利前，一个革命者被敌人流放，关进监狱，是不会使人感到奇怪的，倒会令人感到自豪。革命胜利后，再发生这种事情，就不太好理解了，就是悲剧了。

很不幸，唐有章同志竟成了后一种悲剧式的人物。

唐老今年80岁了，他20岁进黄埔军校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21岁参加广州暴动，22岁被党派到苏联学习革命理论。这时的唐有章朝气蓬勃，对祖国，对世界，对社会主义，对未来的一切，有着多么美好的理想。但好景不长，他24岁就被莫名其妙地关进了监狱，流放到苏联西北部最寒冷的摩尔曼斯克，31岁又第二次被流放到苏联东北部的勘察加对岸的马加丹。这两个地方都在北极圈内，他怎样顽强地熬过那十几个寒冷的冬天，又怎样顽强地熬过了那难以忍受的苦役折磨，这本回忆录将会给你作出回答。

经过长达20多年的审查，他在1957年被苏联有关组织彻底平反了。他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只是年过半百了。

1958年，他携妻挈女回到离别30年的故国。他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。他当然又是没有料到，“文革”那股烈火烧到了他的头上，把他送进了秦城监狱，而且关押长达七年之久。虽然后来也彻底平反了，也是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但被赶回苏联原籍

F-y60/01

的老伴已经去世，而本人也已到了垂暮之年，很难再干多少事了。

我们把唐老一生作个概括：中国50年，苏联30年；年龄80，党龄60；一生革命，半生流放。

唐老走过这么艰难的历程，受到这么不公正的待遇，仍然顽强地生活着、斗争着，仍然充满革命激情，仍然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，毫不动摇。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是一种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他呢？是对共产主义不可动摇的信念。他在坎坷曲折的道路上，不悲观，不后退，在身处逆境的时候，他不只是看到阴暗面，更多的是看到光明面，看到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。这是他对历史，对自己周围一切事物的态度，也是他能够抵制一切诬陷，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。

这当然不是说，制造冤案是难免的，冤案只要一加平反就万事大吉。倒是应该认真思考一下，为什么唐有章最好的年华要在监狱、流放中度过？是什么原因把同志当成敌人？我们究竟应当吸取哪些教训，防止这一类悲剧的重演？

这无疑是老一辈和青年一代共同关注的根本问题。

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，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所以不断犯“左”的或右的错误的根本原因，指明了依靠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，是能够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的。

这本历史的记述，也许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总结历史的教训，更积极地实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历史任务。

目 录

序.....	项 南
--------	-----

我的童年.....	(1)
从湖南第一师范到黄埔军校.....	(4)
广州起义.....	(14)
特殊使命.....	(22)
“天然托派”.....	(28)
第一次流放.....	(41)
过境士兵劳动团.....	(51)
第二次流放.....	(56)
归心似箭.....	(70)
重见叶帅.....	(75)
在农业机械化研究院.....	(80)
第三次入狱.....	(85)
内外交流.....	(98)

后记.....	(107)
---------	-------

〔附〕 七绝(六首)——唐有章《革命与流放》读后

..... 李一凡(110)

我的童年

湖南省攸县新市唐家院是个偏僻的山区小村子，村前一弯小溪，山青水秀，清幽恬静。1906年12月，我出生在这里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。我的童年也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
小时候，家里没有钱供我上学，我整天整日地如山间田陇撒野，上树抓鸟，下水摸鱼，什么都干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村里的长辈都说我多长了一条筋。有一次，村上的财主抓了一个小偷，他们把他捆在板凳上，用竹片打，用香火烧，我看了，觉得这财主实在太狠心了，就跑回家，拿来一把剪刀，趁没人提防，剪断绳子，放跑了那个贼，气得财主四处找放的人，我却若无其事地到溪涧摸鱼玩去了。

那时候，适逢南北军阀在湖南打仗，军阀张宗昌的军队到了攸县，四乡一片兵荒马乱，老百姓都遭了殃。距我家八华里左右的新市，有个在易家祠堂教书的易恒谦先生，为避兵祸躲在我家里。易先生见我没念书，便在北兵退了之后把我带到易家祠堂，免费教我读书。过去看见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学，我非常羡慕，心想自己要能上学有多好！如今竟然有了读书的机会，实在是喜出望外，所以用功，成绩也算不错。

大概是1918年，我考上了攸县第一高等小学，跟同学吴仲华、黄弼教、唐兰芬（后来他们都为革命壮烈牺牲）等人关系很

好，无话不谈。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，对我们震动很大，于是我们的话题自然也就转向中国的出路问题。暑假期间，我们总是在吴仲华家里相聚，纵谈时局，议论国是。

仲华的父亲叫吴莪青，在县城尹大地主家当帐房先生。他象俄国19世纪大文豪托尔斯泰理想中的人物，讲顺从，不主张抗争；也象印度泰戈尔笔下的人物，提倡消极抵抗的作人哲学。对我们的议论，他既感到新奇，但又觉得危险，想多听听，又想劝阻，经常处于这种思想矛盾之中。仲华有些象他父亲，胆子小，毅力弱，但学习勤奋，态度诚实，能辨是非，易于接受新生事物，是他后来能走上革命道路并英勇献身的重要原因。我虽然是个穷学生，但吴仲华家里对我很亲热，不把我当外人看待，所以我很乐意到他家去聊天。有时，我抨击社会黑暗，措辞十分严厉，仲华和他的妹妹文斐，不但没有反感，反而很赞同。特别是文斐，她好学用功，聪慧伶俐，有话必讲，有理必争。她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，说什么也要坚持。她后来也是攸县革命运动的女英杰之一。

记得学校有个花花公子模样的王老师，从不参加全校师生抵制日货的活动，只知吃喝玩乐，不学无术，同学们对他的意见颇大。但他在上面有靠山，校长拿他也无可奈何。有一次，他讲解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“常恨言语浅，不如人意深。今朝两相视，脉脉万重心”这首诗时，称之为爱情诗。我曾读过对这首诗的解说，与他讲的完全不同，就当场站起来批评他的解说不不对，指出这是刘禹锡看到自己房间墙上挂着的利剑有感而写出的诗句。弄得他十分狼狈，他恼羞成怒，趁校长不在，擅自贴出布告，以扰乱课堂秩序为由把我开除出校。我离开学校之后，思想斗争很激烈。到哪里去呢？回家吗？一则怕父母难过，二则内心也不愿意，因

为我是要为穷苦家庭争气，才出来读书的。左思右想，最后决定到县立第二高小去请求入学。我壮着胆子去找第二高小校长余长荣。出乎我的意料，余校长不但收留了我，而且答应我跳一级。

我被王老师开除之后，一高的学生特别是吴仲华、黄弼教、唐兰芬等意见很大，都去找校长张熙评理，说如果不叫我回校就罢课。张校长怕闹学潮，便亲自到二高来找我，叫我回一高继续读书，他还请二高余校长做我的工作。我表示坚决不回一高。张校长只好一遍又一遍跟我讲好话，说当时开除我确系王老师鲁莽从事，没有校长的同意是不能生效的。张校长是我们同学很尊敬的一位长者，曾带领我们到县城参加反对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的斗争，现在他说得这么恳切，我只好表示尊重他的意见。便说：“我可以回一高，但一定要把擅自无理开除学生的王老师赶出一高，否则我死也不回去。”我的要求得到了一高同学的支持。同学们强烈要求把无理开除学生的王老师赶出校门，并提出不迅速叫我回校，则全校罢课。张校长怕事情越闹越大，立即去找县长和劝学所长，结果是将王老师从一高调走了事。

一星期之后，我重新回到一高。当我走进校门时，同学们蜂拥而来，有的提行李，有的拉手，有的简直把我抬起来了。

从湖南第一师范到黄埔军校

1921年，我在攸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。这时，摆在我面前的道路有两条：一是继续升学，一是回家务农。务农这条路随时都可以走，不过自己还下不了决心，老师也鼓励我继续升学。可是我家里穷，要升学又缴不起学费。正在我为难之际，突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，湖南第一师范继续在全省中路所属22个县招收新生，这是一所不收学费、供给食宿还发制服的学校，我当然乐意去报考。可该校只分配攸县一个新生名额，这就令人感到希望不大，但我还是下决心去争取考上。

当时湖南第一师范录取新生的考试十分严格。为了选优，首先在各县高等小学毕业生中进行预考。在攸县参加预考的学生就有100多名，只预取10名去参加由第一师范主办的复考，然后从这10名复考生中录取一名，正式发榜公布。这种考试真使人提心吊胆。我没有作过多的考虑，只是潜心复习，决心一试锋芒，并顺利地通过了预试这一关。

去第一师范的考期到了，父母四处告贷，给我筹好路费。临行时，父亲默默无言，母亲泪水盈眶，而我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决心考好，不使父母失望。来到长沙，同伴们每天把书翻得哗哗响，抓紧时间复习，我却躺在床上，只是在脑子里默默地一遍又一遍温习我过去学过的知识。每考完一科，同伴们回到住处就争

论不休，我仍是那副老样子，闭目躺着。当有人问我考得如何，我只说句考得不好，就不再说说话了。记得考完语文之后，他们为“白马非白”这道判断题的答案争得面红耳赤，有的还一个劲地说，白马当然是白的嘛！我听了暗暗好笑，但也不想去向他们解释。在考试的那几天，我总是早睡晚起，唯有发榜的那天，天不亮我就爬起来了，蹑手蹑足地溜出住处，摸黑朝第一师范奔去。我一阵风似地跑到一师校门外，天还刚蒙蒙亮，学校还没有开门，我爬上铁栅门，纵身蹦到学校传达室门口。守传达室的老头听到声响，出来一把抓住我，要把我赶出去。我说我是来看榜的。他见我一身穿得寒酸，起了怜悯之心，问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回答说“唐有章”。他说榜上好象有这个名字，又说记不清楚，叫我自己去看。我来到发榜的地方，心跳得十分厉害。我从榜上最后一个名字看起，一连默念了十多个名字，就是不见“唐有章”三个字。我又挨次继续往前看，第十名不是我，第五名也不是我，我的额角都沁出汗来了。但再往前一瞄，原来我的名字竟排在第二，我高兴得象中了状元，但我外表还是装着没事一样，一溜烟回到旅馆，钻进被窝，蒙头大睡。还为家里节省了一顿早饭钱。

回到家没有几天，县里派人把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家里。进门时还放了鞭炮。父母亲当然高兴，杀了鸡留送通知的人吃饭，又向邻居借了一吊铜钱打发他走了。那几天，邻里亲戚上门道喜的也不少，我家从来还没有这样热闹过。临上学的前两天，母亲特地替我缝了一套青大布衣服，做了一双新布鞋，用的棉被也给我拆洗补缀好了。那些穷亲戚也你一点他一点给我凑路费。甚至有些唐姓富户，这时也来跟我父子寒暄几句。这真是破天荒！使我父亲也感到因此抬起了头。

我到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，长沙已是气象一新，一师更是生气勃勃，民主、改革的空气非常浓厚。一师招收女生，男女混合编班，就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的。徐特立、李维汉、田汉等老师向我们传授了不少革命道理和知识，还让我们看了许多革命书刊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和塞万提斯的《唐吉珂德》就是这些老师先后于1922年和1924年教给我们的。英国在世界上有多少殖民地，帝国主义如何瓜分中国领土，是一位姓吴的地理老师给我们讲的。还有，当时的毛泽东和夏曦在长沙已经是半公开地从事革命活动。所有这些，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，增强了我们的革命决心（其中也包括我的同乡学友吴仲华、黄弼教，这些同学于我之后也分别考取了省城其他中学）。当时省城发生的每次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学生运动，我们都是最积极的参加者。

1923年至1924年，我们曾在长沙组织了一个“攸县同学会”，发起人有吴仲华、黄弼教、我和其他同学，一共十多个人。目的是团结先进分子，宣传革命思想，打击反动势力，促进家乡青年和人民群众的觉醒。我们还创办了《攸县同学报》，我为该报写了发刊词，平常还与吴仲华、黄弼教积极为该报撰写文稿。其中好的稿件也在其他报刊转载过。记得我曾写过一篇《野火烧长沙》的文章，被转载在《湘江日报》上，内容是揭露湖南省当局的黑暗统治，揭露他们镇压一师及全市学生革命运动的所作所为，文章还列举一师校长易培基被撤职，学生自治会被取缔，学生行动自由受限制等事实，号召在省会求学的各县学生，在军阀赵恒惕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长沙烧一把“野火”。这篇文章使赵恒惕大为恼火，下令查封了《攸县同学报》，我也遭到了省政府和省教育委员会的传讯警告。

我遭此挫折后，心里既气愤又难过。有一段时间，我除了完

成学业外，其余的时间便消磨在运动场上，打网球成了我每天必修的项目。这时候，有一个姓蔡的同学（湘潭人）却关心我，经常找我谈心，并对我说，要参加革命，最好去报考黄埔军校。于是我又振作起来。1926年上学期，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，便在同乡学友吴仲华、黄弼教的资助下到了广州，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五期，被编在入伍生第一团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。因为我有文化，在学习中还能辅导其他同学，所以让我当了班长。

当时黄埔军校开设的课程有政治、步兵操典、内务，还学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英语和日语也学一点。不过这些课程大都在晚上进行。而白天主要是学习步兵操典和进行军事训练。那时担任步兵操典教学任务的教官，是我们一团的团长郭大荣。他是江苏人，早期保定军官学校学生，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。他很有水平，工作很扎实，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。那时他的家属住在广州城内，但他很少回家，只在星期天才回家一趟。他给我们上军事理论课，讲战略战术，也讲现代战争手段和化学武器。他说化学武器并不可怕，只要及时掌握了气候变化特别是风向，化学武器也不能发挥多大的杀伤力。军事训练主要是由我们一连的正副连长和排长主持。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求非常严格。我们一连的连长前后换了三次，最后那个连长姓杨，是个称职的军官。副连长更加出色，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，他的示范动作一招一式都非常标准。他为人严肃，平常不太讲话，也很少笑。对操作和纪律，有时要求近乎苛刻。比如，他讲了动作要领之后，只作一次示范，就叫你自己去练，因此我们都十分小心，注意力特别集中。我们的排长姓张，湖南益阳人，黄埔第四期毕业，他对我们的要求几乎跟副连长一样。不过我那时基本上能按他们的要求完成动作，因此连长、排长都对我很好，有时还叫我当助教，辅导其

他同学。但是这并不是说我比其他战士好过一些。记得有一次操作，我没有按口令把刺刀及时拔出来，当时紧张得红了脸，还悄悄地唉了一声。不料竟被副连长察觉了，他立即把我叫出队列，叫我背上全副武器装备，当着全团教官和学员的面，沿着训练场跑步一个小时。才跑了几圈，我就感到难以支持。好在我有一股犟劲，硬是挺住了这一磨练和惩罚。

军事训练之外还要听政治课。那时给我们讲课的主要政治教官是萧楚女。他讲课观点鲜明，论据充足，浅近生动，极富鼓动性。因此只要是他讲课，我们全团便鸦雀无声，个个都聚精会神地听着。尽管他衣着简朴，还一脸的麻子，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他的仰慕之情。他生活朴素，工作十分辛苦，由于长期操劳过度，染上了肺病，所以讲课的时候总是咳嗽，气色也不好。很多同志劝他休息，他却说，人生象蜡烛，点燃了就不要去吹灭它。他还风趣而诙谐地说：黑夜要光亮，才点上蜡烛。如果天没亮，为了省蜡，把蜡烛吹灭了，那还得在黑暗中瞎摸一气！这些话在我们学生中广为传颂，我们从中懂得了许多道理。

那时候，在黄埔军校任职的共产党人，都是我们敬仰和学习的榜样。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，是另一位杰出代表。恽代英实践经验丰富，他讲课的许多内容是书本上找不到的。因此我们很觉新鲜。他边讲课，边解答同学们提出的疑难问题，仿佛他脑子里就贮存着各种各样的现成答案。他常穿一件齐膝的广东式上衣，不时将手伸进衣袋，掏出手帕摘下高度近视眼镜擦汗。他也患了肺病，身体很虚弱，这可能是他讲课时常擦汗的原因。但他非常乐观，在课堂上你几乎察觉不到他是一个病人，只是在讲完课后，才见他疲惫不堪，象是就要沉沉睡去。

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我们同学当中也享有很高的声望。